

郁达夫：而立之年 在武昌

李杭春

郁达夫在 1925 年这一年的创作相对比较沉寂。用作家自己的话讲，是不言不语不做东西的一年。事实上，他投入大量时间于课堂教学和讲义编写。后来陆续问世的几乎涉及各种文学文体的单行本《文学概说》《戏剧论》《小说论》，想必都是武昌课堂的结晶，也是郁达夫文学经验的总结。

1925 年，郁达夫年届而立。年初，他从北大黯然离场，武昌师大接纳了他。在诗人生命中，1925 是比较低调的一年；在郁氏研究中，1925 也是比较不被重视的一个时间段。随着相关资料陆续浮出水面，郁达夫武昌一年的行踪告诉我们，这是诗人生命中不宜被尘光湮灭和岁月忽视的一个年头。

赴任武昌师大

1925 年的春节来得比较早，1 月 23 日就是旧历除夕。郁达夫是在寒假里的 2 月 4 日（正月十二），应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新任校长石瑛之请，离开北京去的武昌，任教该校国文系。吴虞日记称，1 月 31 日，郁达夫过吴虞处，赠《晨报副刊》一册，并称下周三（2 月 4 日）“当过武昌师大”。

在此之前，北大同人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饯行。据周作人、钱玄同和吴虞等的日记，“因陶孟和夫妇回京、郁达夫将赴武昌教书”，1 月 31 日中午，周作人、张凤举同在东安市场东兴楼饯宴，一为陶夫妇接风，一为郁达夫饯行，同席者有陶孟和、沈性仁夫妇，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马幼渔、马衡兄弟和林语堂、陈通伯、徐志摩、邓叔存、陈百年、江绍原、钱玄同等共 23 人；2 月 2 日，则中午、晚上各有一场公宴，坐中还有胡适之、王抚五、杨振声、吴虞等。

可见郁达夫的离任北大，是比较被公众化的一件事情。但让人疑惑的是 4 月 13 日《北京大学月刊》（第 1667 期）刊出的注册部布告，称“英文系教员郁达夫先生辞职，所授本科第一外国语英文及小说，本星期起均由刘煦燕先生暂代，时间教室照旧”。而照郁达夫本人“从今年的阴历正月，在武昌的狗洞住了半年”（《说几句话》）的说法，1925 年 2 月 4 日到 4 月 13 日期间，郁达夫是否并且能否还在北大兼课，还是一件需要思量的史事。

“武昌师大的校址在阅马厂（武昌城内的一个广场）之东，东间壁是抱朴堂，即张之洞别墅所在地，堂的四周遍植桃花，每逢花开的季节，游人麇集，热闹异常。”武昌师范大学李俊民在《落花如雨伴春泥——郁达夫先生殉国四十周年祭》一文中记下了第一次见到郁达夫的情形：

一九二五年二三月间，我回到武昌师大，到校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去看望郁先生。一个傍晚，我在学校东北角教师宿舍的二楼西侧的一间房子里，第一次会见了，看到他的神情与姿态，和我思想中所构成的形象，似乎是吻合无间的。他待人恳挚，洒脱可喜，使我一见倾心。……在他驻足的这个大房间里，除一张床铺和写字台以及一张方桌外，满屋塞满了古今中外的书籍。日文以外，大部分是西书，包括英文、法文和德文。

不平静的校园

武昌校园并不平静，郁达夫数度被卷入风波；其在武昌师大的进退，又多跟校长石瑛脱不开关系。

石瑛到任之前，武大主持无人，百废待兴。为武昌师大升格为国立武昌大学，石瑛致力于治理与改革，并坚持重新审定教授资格及学识。此举引起教育哲学系主任、《夕阳楼日记》中未被点名的那位译者余家菊的不满。因余仅在伦敦大学听半年，以所学无疑恐被淘汰。余遂以辞职相胁，同时又作匿名信谩骂校长。此举大令学生反感。2 月 21 日，武昌师大举行联席会议，抵反不久的郁达夫与杨振声、张晋言、黄侃、陈建功等一同出席，并站在武大师生一边，支持全体学生发表宣言，“誓死驱逐余家菊，挽留石校长”。《武昌大学又起风波》，《民国日报》1925 年 2 月 28 日。

这学期末，因辞退黄侃、黄际遇、王慎等三位教授引学生不满，加之学校经费无着，开学不久的 9 月 12 日，《申报》刊登消息：“武大校长石瑛自京函代理校务西屏，囑办辞呈送致部。”校园内外一时舆论四起，武大发生第二次风波。

此次风波本以教育部挽留和石瑛返校，已于 10 月初趋于平静。但一向视军阀为毒瘤的郁达夫却因黄侃一拜门弟子以“国文系学生”名义上书“湖北的军政当局萧耀南”，“来左右校长，用一个教书的人”这样一件“不体面的事



郁达夫《文学概说》
(商务印书馆，1927)



郁达夫《小说论》
(光华书局，1926)

情”而义愤填膺，10 月 17 日，他作书《现代评论》记者，题《说几句话》，并且以失之冲动的“武昌的狗洞”引起新的矛盾，旋被卷入风波中心。

这个时候，郁达夫已身在北京。赴京前，他对学生说要“到北京找校长，请教员”（蒋登章《武昌师大国文系的真相》，《现代评论》1925 年第 3 期）。推测来看，最大可能是行前郁达夫已经递交了辞呈，“本来打算不再出京了”（《一个人在途上》），故此“职守俱无，穷愁潦倒”（《说几句话》），并且拟请教员以自代。10 月 23 日，吴虞收到郁达夫寄自武昌的两封快信，言武大请吴虞往武大教授国文，月薪 240 元；12 月 12 日，郁达夫电吴虞，称武大聘其任国文教授（《吴虞日记》），此或是“请教员”行动之一。

11 月上旬，郁达夫得辞武昌大学教职，13 日从武昌去了上海。

课堂内外

郁达夫这一年的创作相对比较沉寂。用作家自己的话讲，是不言不语不做东西的一年。小说创作仅有《寒宵》和《街灯》两个短篇（后合题为《寒灯》）：“当初的计划，想把这一类东西，连续做它十几篇，结合起来，做成一篇长篇。……但是后来受了各种委屈，终于没有把这计划实行，所以现在只好将这未完的两断片，先行发表了。”（《创造月刊·尾声》）；散文也只有《送仿吾的行》等寥寥几种。

事实上，这一年，郁达夫投入大量时间于课堂教学和讲义编写。与此前曾在安庆法政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讲授英文、讲授统计不同，在武昌师大（1925 年 4 月以后为武昌大学），无论课堂上，郁达夫都是纯粹的文学教授，讲授文学课程，培养文学青年：“武昌师大实行选科制，他开出的选科是文学概论、小说论和戏剧论，自编讲义。”（李俊民《落花如雨伴春泥》）

后来陆续问世的几乎涉及各种文学文体的单行本《文学概说》《戏剧论》《小说论》，想必都是武昌课堂的结晶，也是郁达夫文学经验的总结。收入《文学概说》的编译文论《生活与艺术》文末志有“书后”：

这一篇生活与艺术，是到武昌后编译的第一篇稿子，预备作近来打算编的文学概论的绪言的。因为这一次匆促南行，带的书不多，所以不能举出实例，内容空虚之讥，是我所乐受的。此稿所根据的，是有岛武郎著的《生活与艺术》头上的几章……

《小说论》的问世也颇具戏剧性。沈松泉《回忆郁达夫先生》中有记：

1925 年冬，有一天达夫先生到光华书局来，我正好在店里，他看见我就说，“松泉，我有些急用，需要一百元钱，我这里有一部稿子给你，就算是稿费吧。”说着，他就从袖袋里取出一卷稿子来。尽管目前尚未能明确郁达夫陪同出席了上述哪几场演讲和欢迎活动，但 29 日上午，胡适《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中不少观点，是被郁达夫记录在《咒（甲寅）十四号的〈评新文学运动〉》一文中，

对各文体写作作出的系统梳理和理论总结。其方法和结论，今天来看，都极具个人体会和前沿意味，也是郁达夫留给世人的一类别具风格的文学实绩。

在武昌师大，郁达夫还曾指导国文系学生组织艺林社，并主动介绍至北京晨报社，得报社同意，于 4 月 10 日在《晨报》副刊创设专刊《艺林旬刊》，以提供“国学的研究和关于文艺上的各种问题的讨论”，黄侃、熊十力等均有论作在该刊发表，郁达夫更是支持了多篇文论，包括《诗的内容》《诗的意义》《文学上的殉情主义》和一次演讲实录《介绍一个文学的公式》。自第 17 号后，该刊脱离北京晨报，改由艺林社独立出版。对此，沈从文在《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文中专门提及：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因杨振声、郁达夫两先生应聘主持中文系讲“现代中国文学”，学生文学团体因而活动，胡云翼、贺扬灵、刘大杰三位是当时比较知名和活跃的青年作家。

后来，刘大杰、胡云翼成为颇有建树的史学家、词学家，贺扬灵英年早逝，从政期间亦以诗人才学著称。

促成胡适武汉巡讲

4 月 30 日，深省风潮之害的郁达夫与同事杨振声、江绍原联合致函胡适，邀请其来汉讲学：“……有感于退职之教职员屡次破坏武昌师大，皆经失败，故今又怙愿黄先生辞职，目的在使该系学生，因失课而起风潮。平此风潮惟一的方法，在请众人所心悦诚服之学者，来此作课外讲演。所以石斋青先生同我们都竭诚请先生来讲演一次”，“先生来此讲演的时间，一星期或两星期均可”，“讲题先生可以便定，但时间必须在五月内，愈早愈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虽然落款由杨振声代签，但胡适此行，郁达夫是全程参与联络的。

“五月内”的最后一周，9 月 26 日，胡适南下抵武汉，29 日开始在各校演讲，至 10 月 5 日。其《南行杂记》有记：

这回南下是受了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的邀请，去演讲五次。但到了武汉以后，各处的请求很难拒绝，遂演讲了十余次。

原五次演讲包括武昌大学的《新文学运动的意义》《谈谈〈诗经〉》（9 月 29 日）、《中国哲学史鸟瞰（一、二）》（10 月 1、3 日），和商科大学的“文化侵略”（10 月 2 日），后来增加了在文科大学、华中大学、武大附中、湖南中和和青年会、银行公会等处的演讲，总计在汉演讲 13 场，另外，胡适还莅临了武大学生欢迎会、武汉各界欢迎会和教授公宴等活动。

胡适在汉期间，郁达夫与之多有交往。胡适称“见着许多新知旧友，十分高兴。旧友中如郁达夫、杨金甫，兴致都不下于我，都是最可爱的”。尽管目前尚未能明确郁达夫陪同出席了上述哪几场演讲和欢迎活动，但 29 日上午，胡适《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中不少观点，是被郁达夫记录在《咒（甲寅）十四号的〈评新文学运动〉》一文中，

作为对桐桐（章士钊）先生评点的回应的。

10 月中旬，诗人千里返京，什刹海北岸那个温馨的家，对郁达夫日夜奔波的辛苦和“万料不到”的被逐当是一种治愈。这一年暑假，夫妻两个，日日与龙儿伴乐，无论湖滨散步，吃饭看戏，还是摘葡萄，打枣子，一家三口总是形影不离，尽享天伦：“这一年的暑假，总算过得最快乐，最闲适。”（《一个人在途上》）

而这一年的武昌体验，在郁达夫也是一言难尽。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



第 455 期



122 期

当代法国哲学家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曾断言，现代性正随着公共再现的逻辑而瓦解。在短视频、全息投影、超高清图片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越发可以理解图像（image）不再单纯地刺激感官，模拟人们的现实生活——视觉技术的野心在于建立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新现实；人们不再仅仅止于肉眼观察世界，通过日益强大的视觉技术，人们更乐于通过镜头去接触世界。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头号玩家》就展现了虚拟现实技术对于未来人类的感官控制，哪怕现实世界已经是一片荒漠，人们依然可以沉迷于数据构造的“绿洲”中，维系情感、欲望与社会交往。它透露出视觉技术对于未来的预言，在更强烈的感官刺激面前，人类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以往和世界打交道的感知方式。

本雅明无疑是最早察觉出这一征兆的思想家。他在《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文章中，都勾勒出照相术和电影技术所带来的日益加剧的威胁。学界不厌其烦地讨论灵晕（Aura）的中文翻译，却不愿跟随本雅明一起关注视觉时代的感官危机。对本雅明来说，灵晕不是一个纯粹的审美概念，它标志着凝结在艺术品中的本真性，又同人们的感知方式息息相关。原本人们需要在某种仪式中感知艺术作品，本真性植根于它的仪式价值和使用价值。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只可能在西斯廷教堂参加宗教活动的时候才能欣赏到米开朗基罗的油画《创世纪》。如今，这幅油画可以被印刷在书籍之上，出现在广告牌中，甚至可以被“二次元”化处理。很显然，艺术作品已经远离了它的现场，在它的无限传播中，艺术作品的本真性开始加速贬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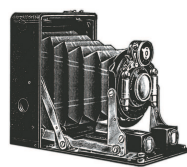
但无论如何，人们还是能够通过肉眼观看油画。但到了照相术和电影技术降临的时代，人们所看到的相片和电影都是镜头运用的产物。照相术可以放大或缩小拍摄对象的尺寸，电影可以控制视觉的速率与节奏，人们只能接受镜头运动的指令。相较于肉眼观察世界的直观，镜头语言明显要暴力得多。世界整体呈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它依然遵循着自然的秩序，但镜头的运动则要求粗暴地干涉对象世界，并以电影语言的方式加以重组。

本雅明用精妙的比喻揭示了画家和摄影师的差别。画家就好比古代的巫师，画家在作品中同现实保持着一段距离，就像巫师在患者身上保持自然距离，借助经验来判断现实；但是摄影师就像是外科医生，外科医生要将手术刀刺入患者体内，摄影师则深深地刺入了现实的躯体。这两种对待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手段，反映出摄影技术的全部辩证性；摄影的创造深度完全取决于它对于世界的改造程度，现实世界越是被肢解得彻底，影像世界才越能多姿多彩。

由此，我们触及本雅明所提示的感官危机。一方面，视觉技术全力地冲击现实世界，从蒙太奇到鬼畜视频，视觉技术的先锋性总是不断超出它的预期，实现仿佛无止境

视觉技术时代的感官危机

祁涛



的效果。换言之，视觉技术总是属于未来的，当现行的视觉技术还没有足够成熟之际，它就已经开始畅想更遥远的未来。另一方面，视觉技术对于人的感知方式提出了更激进的要求，快速剪辑显然比长镜头更加符合碎片化时代的需要。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快速变动的节奏让长镜头的电影技术显得格格不入，后者恰好是最符合人类自然观看的方式。现代生活及其视觉技术要求人们的感官适应肉眼无法捕捉、却在镜头中游刃有余的影像效果。比如对于高速运动的慢镜头捕捉、微观世界的影像还原，等等。人们不仅要能适应这些“反自然”的视觉效果，还被要求把这些效果看成是更有魅力的现实。如果听觉、嗅觉和味觉还在和世界的节奏相同步，那么视觉技术呼唤人们不满足于现实，而是去构建视觉中心主义的虚拟现实。

本雅明万万想不到，21 世纪的视觉技术带来的感官危机，远比他 20 世纪的预言来得更重。在我们还在技术时代保持反思的时刻，本雅明再度获得了重读的理由。（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论衡

《争鸣》与《对话》

编译/本报记者 李纯一

去年夏末，法国最负盛名的思想评论杂志《争鸣》（Le Débat）宣布停刊。创办于 1980 年的《争鸣》是伽利玛出版社旗下杂志，议题偏重政治与文学，但核心使命是非常法国式的思考——即社会科学和哲学的结合。创刊人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是研究法国文化记忆的历史学家，后来荣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早期撰稿人中有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和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争鸣》曾经在法国左翼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近日，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发表评论，说法国各界的知识分子认为，这份杂志是在从美国“进口”来的更意识形态化的身份政治大潮下，逐渐不支的。

在许多法国人看来，美国式的“社会正义”政治是一种恶变。去年春天，乔治·弗洛伊德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美国各地的抗议和骚乱导致雕像和其他公共象征被大举拆除。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即警告说，法国不会效仿。到秋天时，马克龙开始猛烈抨击外国大学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建立在另一种历史之上，不是我们的。”接下来，他特别提到“从美国引进的某些社会科学理论”。2007 年，《争鸣》杂志主编马塞尔·戈谢（Marcel Gauchet）曾提醒说，身份政治关注的不是人民的主权，而是个人的主权。如今，始终拒绝“进口”理论的《争鸣》杂志应声倒下。

不过，安托万·忒内（Antoine Trainsel）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撰文说，马克龙剑指后殖民研究和批判种族理论，保卫所谓法国传统，是为

他 2022 年选战做准备；他说那些历史和传统“不是我们的”，是在否认法国的殖民历史和社会现状。法国一直害怕美国化，也一直有着文化上的优越感，而这次马克龙的姿态是意在用法国“例外论”唤醒他的极右翼票仓。

这看起来是“理论武器”进出口的倒转。曾经，“法国理论”风靡美国。直到二三十年前，也就是福柯和德里达的时代，人们还可以说美国在智识问题上服从法国。有趣的是，如忒内指出，今天“从美国引进的某些社会科学理论”正是从早前的“法国理论”发展而来，斯皮瓦克、朱迪斯·巴特勒、霍米·巴巴等等都是基于法国知识分子的概念和分析再作阐发。

“法国理论”的“推手”之一，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介绍到美国的文学理论家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 1923—2015）曾经打趣说，他这是“把瘟疫带来美国了”。法语里没有“法国理论”一词，这是一项美国的发明。近日，恰有一本吉拉尔的访谈合集《与吉拉尔对话》（Cynthia L. Haven 编，Bloomsbury Academic, 2020）出版，可以读到当年他对“法国理论”被美国人文学界食洋不化地奉为真理的进一步“吐槽”。例如，如果拉伯雷再世，“会对我们现在的经院哲学”大加取笑，以及：

下一代会想知道，是什么冲动可以让那么多人无休止地写作，而且完全是无中生有地写出最复杂难解的文章，不仅同他们的生活现实，也同伟大的文学文本断开连接。他认为，这些现代的经院哲学一直“无耻地寄生于伟大的文学文本之

上”。而最让吉拉尔沮丧的是他在学界同仁中观察到的残暴与虚无主义——尽管这是对他著名的“模仿”理论的又一证明。这一理论认为，欲望是模仿而来，不是我们自己的；人们就是因为想要同一样东西而产生冲突，也就是说，冲突是因为我们互相雷同。吉拉尔发现，他的同行们代表了一种最奇特的狂热：一种什么都不相信的狂热。他们可以毫无理由地发动最血腥的智识战争，中伤和羞辱他人，甚至毁掉他们的事业；

当人们真正相信某种比学术界更大的真理时，他们就不会像那些什么都不相信的人那样狂热地追求学术上的成功……当前的虚无主义非但没让人变得更放松、更适度，反而让学术生活变得更艰苦，也没有过去那么富有同情心。

吉拉尔不是那种“孤独的思想者”，他喜欢“与人合作解决问题”，常在发表正式观点之前先进行“内测”，邀请谈话伙伴提出质疑。编者说，阅读吉拉尔多年来的对话，犹如看他在暗房中慢慢显影。

在法国出生长大的吉拉尔在斯坦福大学任教近四十年，平素举止优雅而严肃，也正因此，他拿刺儿挺起人来可真是致命：“看看学术界，那一大群像羊一样的个人主义者。”他的幽默嘲讽也针对自己，回忆起到美国的头几年，他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得到一辆车”。在另一次采访中，他评价萨特“在内心深处是一个自得其乐的小资产阶级，热衷旅游，是个喜欢过太平日子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天才”。